

編後語

繼上期「有關未來全球文化衝突」的討論，本期「二十一世紀評論」續有三篇對亨廷頓的回應文章。許倬雲、劉述先批評亨廷頓戰國策士式的心態，而何信全則基本肯定亨氏的觀察具有洞見。但三位論者都指出，不能把國際政治與文化問題混為一談。許劉二位更強調儒家文化對調諧世界各文明之間關係的積極意義。

今年十二月毛澤東百年誕辰之際，我們共發表六篇文章，從不同角度討論毛澤東思想及其影響。金觀濤通過對〈實踐論〉的文本分析，進一步闡述毛澤東思想為馬列主義的儒家化這一觀點。而從袁振國對1958年毛澤東教育革命模式的論述可以看到，大同社會理想怎樣影響毛澤東，使他反對以傳授書本知識為主的現代學校教育模式。周群、姚欣榮則應用社會學理論，考察毛澤東崇拜從文革時的祖先崇拜式轉向當今模擬鬼神崇拜的轉變，指出兩者都是傳統形式的變構。馬軍驥、高名潞具體分析了電影、美術中毛模式的形成，楊小濱則論述先鋒文學如何消解毛語的創傷。可以說，這一組文章，談的都是新老傳統對當代意識形態的塑造。毛澤東思想作為馬列主義的一支，卻又深深打上中國傳統文化的印記，這表明二十世紀的意識形態之爭並非如亨廷頓所說只是西方文明的內部衝突。

除了分析新舊毛澤東崇拜現象之外，本期還有兩篇討論民間文化的文章。魄帝對關羽由歷史人物變為傳奇英雄，再到由官方倡導逐步蛻變為在民間與觀世音菩薩並列的關帝神，作了有趣的概述：從中可見儒家道統教化和民間信仰的關係。近年來，東亞經濟發展中的文化因素一直是學術討論的熱點。李亦園提出了傳統中國宇宙觀三層面均衡模型，他用這個以「致中和」觀念為核心的模型，不但解釋了傳統上層文化與民間文化的整合，並結合現實台灣、海外華人社會中的事例，說明傳統中國文化在當代經濟行為中，依然有活力。

本期三篇書評也頗值得一讀。特別是童世駿評柯亨、阿拉托的新著《市民社會和政治理論》一文，可以有助於我們理解市民社會概念演變，以及當代社會主義國家的崩潰和西方福利國家的困境。

此外，本期〈渾沌與偶然之間〉一文特別值得注意，因為這是湯家豪教授用顯淺語言介紹他最新開創性研究結果（事實上論文還未刊出）的文章，真正說得上是科技發展的前沿，和純粹介紹性文字又不一樣了。